

中國哲學史教程

下
冊

● 刘宏章 傅云龙 束际成 主编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教程

下 册

刘宏章 傅云龙 束际成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100号

中国哲学史教程

下 册

刘宏章 傅云龙 束际成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下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11.5印张 297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035-0644-X/B·53

定价：6.70元

目 录

第一章 近代哲学的先声	(1)
第一节 龚自珍、魏源的变易新论.....	(1)
一 龚自珍的“主逆”变易观及“心力”说	(2)
二 魏源的变易进化思想和知行观.....	(6)
第二节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	(11)
一 洪秀全的宗教宇宙观与辩证法因素	(12)
二 《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	(14)
三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16)
第二章 维新派的启蒙哲学	(21)
第一节 康有为的“三世”说和“大同”空想.....	(21)
一 变易进化观和“公羊三世”说.....	(23)
二 人道主义与“大同”空想.....	(28)
第二节 梁启超的“三世六别”的历史进化论及 “新民说”	(33)
一 “自变”论和“三世六别”的进化论.....	(34)
二 鼓吹“道德革命”的“新民说”	(37)
第三节 严复的哲学思想	(39)
一 “物竞天择”的进化论.....	(40)
二 “且演且进”的历史观.....	(44)
三 重视“阅历”、“实测”的认识论.....	(48)
第四节 谭嗣同的“仁学”哲学.....	(52)
一 “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和“以太通之具”	(53)
二 “日新变化”和“微生灭”、“破对待”	(57)
三 “学当以格致为真际”和“转业识而成智慧”	(60)
四 “冲决网罗”和“以心力挽劫”	(62)
第三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哲学	(67)

第一节 陈天华、邹容的反帝爱国和民主革命思想·····	(67)
一 陈天华的思想及其哲学评价·····	(67)
二 邹容的《革命军》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73)
第二节 章太炎的前期唯物主义和后期唯心主义思想·····	(77)
一 前期机械唯物主义和进化论思想·····	(78)
二 后期主观唯心主义和崇佛思想·····	(82)
第三节 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89)
一 进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物质、精神观·····	(90)
二 知难行易的知行观·····	(94)
三 民生史观·····	(99)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103)
第一节 李大钊由进化论向历史唯物论的转变·····	(106)
一 前期进化论宇宙观及其理性主义倾向·····	(107)
二 思想的飞跃和对唯物史观的把握·····	(113)
第二节 陈独秀由进化论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119)
一 由激进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121)
二 从进化唯物论到历史唯物论·····	(124)
第三节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阐释和传播·····	(129)
一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阐释和运用·····	(131)
二 在理论战线上的哲学批判·····	(136)
第五章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在我国传播·····	(142)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在我国传播概况·····	(142)
一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在我国传播的过程及其逻辑·····	(142)
二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在我国传播的历史影响·····	(144)
第二节 实用主义的传播与胡适的哲学·····	(145)
一 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45)
二 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	(149)

第三节 柏格森主义与张君勱的“玄学”	(156)
一 张君勱对柏格森主义的介绍和宣传	(156)
二 张君勱的“玄学”人生观	(158)
三 张君勱的直觉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163)
第四节 马赫主义的传播与丁文江、王星拱的 “科学”宣传	(166)
一 丁文江宣传科学、反对玄学的马赫主义	(167)
二 王星拱的马赫主义哲学观点	(176)
第五节 新实在论、康德主义与张东荪的哲学著述	(180)
一 张东荪的康德主义认识论	(181)
二 张东荪的新实在论的宇宙观	(192)
第六章 中西哲学的融合与新哲学体系	(199)
第一节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	(201)
一 东西文化观	(202)
二 直觉主义哲学思想	(210)
第二节 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唯心主义哲学	(219)
一 “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的宇宙本体论	(220)
二 “离心无境”、“反求本心”的主观认识论	(229)
三 “相反相成”、“去故生新”的唯心辩证法	(236)
四 “各有体用”、“中西互济”的文化观	(238)
第三节 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	(239)
一 “最哲学的形上学”体系	(240)
二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	(246)
三 中西文化观	(254)
第四节 金岳霖的本体论和知识论	(257)
一 以“道”为最高范畴的本体论	(258)
二 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的知识论	(268)
第五节 贺麟与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278)
一 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贺麟的贡献	(280)
二 探索建立中国新哲学的途径	(285)
第七章 国民党官方哲学的破产	(290)

第一节 从戴季陶的“民生论”到陈立夫的	
“唯生论”	(291)
一 戴季陶的“民生论”	(291)
二 陈立夫的“唯生论”	(294)
第二节 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及其破产	(297)
一 力行哲学的思想实质	(298)
二 “力行致知”与“知难行易”	(303)
三 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	(308)
四 力行哲学的破产	(311)
第八章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	
承和发展	(314)
第一节 青年毛泽东思想的转变	(317)
一 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318)
二 由唯心主义者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	
的转变	(322)
第二节 形成和发展中的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325)
一 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325)
二 以《实践论》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330)
三 以《矛盾论》为核心的辩证法	(337)
四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	(345)
第三节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	
承和发展	(351)
一 沿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加工、改造成为毛泽东	
的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	(352)
二 沿用中国哲学和古代典籍中的古老命题,加工、	
改造用以表述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基本原理	(354)
三 总结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想资料,作出新的理论	
概括,使之成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356)
四 引用历史文化典籍中富有哲理性的成语典故,促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民族化	(359)
编后记	(361)

第一章

近代哲学的先声

1840年4月，帝国主义对华发动了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社会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的作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及其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的统治和压迫，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极其缓慢，其势力也非常软弱。同这种社会经济变化相联系，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向何处去开始成为中国近代的中心问题。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变革社会、振兴民族，不断探索、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的“变易”、“更法”的思想，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及主要反映农民阶级利益要求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以神学形式出现的革命辩证法及空想社会主义，洪仁玕《资政新篇》所反映的破除封建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都是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第一节 龚自珍、魏源的变易新论

龚自珍、魏源是19世纪上半期的地主阶级改革家，是从封建哲学向资产阶级哲学转变的启蒙思想家。他们面对封建社会的衰

颓，呼唤时代的风雷，要求打破封建主义的思想禁锢，主张“更法”、“变古”，救亡图强，振兴民族。他们在哲学上都强调变易，注重实行，但又迷信“心力”，晚年又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佛教唯心主义。他们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先驱。

一、龚自珍的“主逆”变易观及“心力”说

龚自珍（公元1792—1841年），字璦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杭州）人。他年幼时随其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学汉学，年轻时又随常州学派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是学问渊博的思想家和诗人。他关注世事变化，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他的诗文，大多充满着爱国的激情。“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表现了他决心冲破暮气沉沉的政治局面，要求变革社会，开一代新风的宏愿。他的著作，解放后有中华书局编印的《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特别推崇《周易》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变易”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首先，龚自珍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阴阳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法，认为世上任何事物都非孤立存在，都有着与之对立的、相反的一面。他说：“万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势。万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辩。相倚相譬也，故有烦惑狂乱；有烦惑狂乱，故有圣智。”（《壬癸之际胎观第七》）所谓“相倚相譬”，即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正因为任何事物都处在“相倚相譬”的矛盾关系中，才产生许多“烦惑狂乱”，才需要有“圣智”去排烦治乱。

其次，龚自珍根据事物的“变易”原则，提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主反”、“主逆”学说。他认为，事物的立与反、顺与逆是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的，事物的发展就是从立到反，从顺到逆的过程，“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总趋势在不断地变化。他认为客观事物在其变化发展过程中出现诸种复杂的情

况是自然而然的，这就叫“立”、“顺”，而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治理，就叫“反”、“逆”。例如上面所说的由事物之间的“相倚相譬”造成的“烦惑狂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立”、“顺”，而“圣智”去排烦治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参与、作用，就是“反”、“逆”。他所谓“乱，顺也；治乱，逆也”，“天用顺教，圣人用逆教”（《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都是这个意思。魏源十分赞赏龚自珍的“主逆”思想，他说：“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能殆宕百世以下之魂魄”（《定庵文录序》）。龚自珍的“主反”、“主逆”说，是他“变易”思想的精华，反映了时代精神。

龚自珍的“主反”、“主逆”的变易学说，是基于他对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的深刻认识而形成的一种变革思想。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由康乾盛世走向衰世的阶段。社会贫富两极尖锐对立，“贫相轧，富相耀；贫者占，富者安；贫者日愈烦，富者日愈壅。”（《平均篇》）封建大官僚高居要位，腐化无能，社会人才衰竭，“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阉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乙丙之际箴议第九》），整个封建社会病态严重，死气沉沉。龚自珍认为，社会出现这种腐败的现象，出现衰退，是社会发展的“顺”，而作为有识之士起来揭露、批判这种腐朽的现象，改变这种“顺”势发展的腐败、衰退局面，促使社会向着相反的方向即进步的方向发展，这对原先“顺”势发展的状况来说，就是“逆”。“天用顺教，圣人用逆教”，“逆”转正在退化的趋势，“反”掉正在扩散的病态，变革社会，振兴民族，这就是龚自珍“主逆”变易观的实质。可见，龚自珍的“主逆”说，不只是古老的变易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复活，而且是一种充满批判精神和进取精神的社会学说。

基于这种“主反”、“主逆”说，龚自珍借来“公羊三世”说，提出变易的历史观。所谓“公羊三世”说，来源于《春秋公羊传》，此书把春秋十二世分为三等，即所谓“所见世”、“所

闻世”、“所传闻世”三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后来的公羊学者何休注解《公羊传》，把“所传闻世”解释为“衰乱世”，“所闻世”解释为“升平世”，“所见世”解释为“太平世”。龚自珍重新提出“公羊三世”说，并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不仅春秋时期可划分为三世，就连整个历史都可划分为三世（参看《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即治世、衰世、乱世三阶段。“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乙丙之际箸议第九》）衰世是从治世到乱世的过渡阶段。他认为当时的清王朝已走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阶段，如果这样“顺”势发展下去，必将很快灭亡，只有“逆”转这衰颓的趋势，改变这腐败的现实，才能救亡图存。因此，龚自珍极力主张“变易”，“探世变也，圣之至也。”（《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探讨社会历史的变化，实行改革，才是最高明的。他当时强调的改革就是“更法”，他曾大声疾呼“奈之何不思更法”。他说：“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侈，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乙丙之际箸议第七》）这里，龚自珍警告统治者，拘泥于前代之法，害怕众人之批评，自己不思改革，那只有等后起王朝来改革，与其被后兴者推翻，还不如自己主动实行改革。龚自珍熟读史书，深知社会的变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他说：“珍自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他还认为，对于社会变化的“大势”，任何史家都必须遵循，“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势”（《与徽州府志局纂修诸子书》）。龚自珍强调变易的历史观是他主张“更法”的理论依据。这对后来的戊戌变法有着直接的影响。

变化，是“古今之大势”，那么，历史演变的动力是什么呢？按照儒家传统的说法，是圣人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化。龚

自珍一反儒家传统的历史观，提出“众人自造”的观点。他说：

“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在龚自珍看来，历史非圣人所创造，历史的发展也并非受什么“道”和“太极”所支配所决定的，历史是“众人自造”的，即“我”创造历史。所谓“我”，即“心”，即主观精神。他说：

“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同上）从自然界的日月山川到社会生活的言语伦纪，都是“我”造成的。他进一步提出发挥“心力”的作用去改造社会：“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

（《壬癸之际胎观第四》）龚自珍强调“众人”、“自我”、“心力”的作用，都是颂扬意志的力量，这显然是一种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哲学。龚自珍的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哲学，它已朦胧地反映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具有近代启蒙的意义。但是，龚自珍这种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哲学最终要导致神秘主义。他要求变革现实，却找不到变革现实的客观力量；他鼓吹“心力”，却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受挫而陷于困境。

于是，龚自珍晚年转向佛学，写《发大心文》，幻想凭借无边法力，普度苦难中的众生，把他们引向“极乐世界”。他还宣扬天台宗的理论，说：“十方、三世，所有微尘非他，知见而已矣。自佛知见，乃至地狱知见，皆遍一切处。汝开饿鬼知见，鬼法界遍一切处；开畜生知见，畜生法界遍一切处；开地狱知见，地狱法界遍一切处。”（《法性即佛性论》）他把世界看成是多重的，有什么样的“知见”就有什么样的世界，如果“开佛知见”，就会出现一个永恒真实的佛的极乐世界。这种神秘主义的“知见”说，是他过分推崇“心力”的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

二、魏源的变易进化思想和知行观

魏源（公元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曾做过江苏东台、兴化县知县和高邮州知州，筹议过财政、盐务、水利、漕运等，较多地接触社会实际。他在鸦片战争中参加过两江总督裕谦领导的抗英斗争，赞同林则徐抵抗英国的侵略。他编写过《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影响深远。《海国图志》是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魏源在此书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即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以抵抗西方的侵略。为此，他曾到香港、澳门考察，肯定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于封建制度。魏源和龚自珍一样，也呼唤时代的风雷，希望冲破沉闷衰颓的局面，他在《海国图志序》中说：“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他的著作，1975年由中华书局编辑为《魏源集》。

魏源是龚自珍的好友，在哲学思想上与龚有共同之处，即强调变易。他说：“物其有矣，维其时矣。”（《默觚·治篇五》）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存在（有），都要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他观察到事物的矛盾对立及转化，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默觚·学篇十一》）又说：“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屈之甚者信（伸）必烈，伏之久者飞必决。”（《默觚·学篇七》）他认为，正因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包含着矛盾，所以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生变，变生化，化生无穷。”（《默觚·学篇十一》）他十分赞赏《易经》、《老子》、《孙子》中的朴素辩证法，他说：“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孙子集注》序）

魏源针对宋明理学家“专言三代”的复古主义，提出了一些历史进化的观点。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

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默觚·治篇五》）他从人类的饮食、衣着、婚丧习俗的变化和各种制度的差异来论证历史变化的必然性。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的运动，因此，他反对“宋儒专言三代”，认为“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同上）。后代胜前代，今胜古，这是历史不断演变的趋势。他还对后代胜过“三代”进行了具体的论证，说：“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变为郡县何异？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秦人崛起，乃广求异国之人而用之，……由是六国效之，游士大起，……秦汉以后，公族虽更而世族尚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自唐以后，乃仿佛立贤无方之谊，至宋明而始尽变其轍焉。……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代公也。”（《默觚·治篇九》）这“三大端”即刑罚、政治制度、用人制度方面的不同，足以证明后代胜前代，迷信“三代”是错误的。

基于这种“后世之事胜于三代”的历史进化观，魏源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变古”。他说：“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虽圣王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也。”（《默觚·治篇五》）社会的法制总是在不断变革中逐步完善的，把前代沿袭下来的制度改革得愈彻底，就愈适合当时的情况，愈便利当时的老百姓。有利于人民的社会变革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魏源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海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同上）魏源以“便民”、“利民”作为社会变革、历史进化的原则，反映了他对“人群”作用的重视。他说：“天地

之性人为贵，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危，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默觚·治篇三》）天子由众人所积而成，天子属于众人中之一人，这同龚自珍“众人自造”历史的命题是一致的，反映了某些民主性的思想。但是，魏源所说的变革，只是改变一些具体的制度，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因此，他又提出“其不变者道而已”（《默觚·治篇五》），认为封建社会的“道”是永恒不变的，并主张“以真常不变之道救之”（《老子本义》），这就暴露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局限性。

魏源的变易思想和进化历史观是针对现实的。目睹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积弊丛生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他在提出“变古”的同时，还主张放眼世界，学习西方，以抵抗西方的侵略，这就是他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1826年，他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指出“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主张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法。鸦片战争失败后，他于1842年写了《圣武记》，于1845年编了《海国图志》，分析鸦片战争失败的历史教训，探讨富国强兵之路。他在《海国图志序》中运用《孙子兵法》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辩证法思想，提出要战胜敌人，必须重视了解敌情，分析敌情。他说：“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就是说，要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首先必须要“知其形”，“知其情”，即了解西方。他明确指出，他编写《海国图志》一书的目的，就在于主张学习西方而制服西方，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序》）所谓“长技”，主要指西方的战舰、火器及养兵、练兵之法。魏源还具体建议，在广东开办

造船厂、火器厂，聘请美国、法国的技师、工匠来制造战船、器械，聘任西洋舵师来教练行船演炮之法。他认为，对于西方的技术，只要有益于中国之富强，都可学习仿效。魏源这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当时作为抵抗侵略、救亡图存的战略，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外国都发生一定的影响。

魏源在认识论方面有较丰富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强调行对于知的作用，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学篇二》）知从行中来，行是知的基础，要获得真知，就要亲身经历，接触实际事物。他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默觚·学篇二》）所谓“一足”、“一瞥”、“一啜”，都是指人的感觉器官与客观事物的接触。他认为，对于外界事物，只有“亲历诸身”才能获得对事物的认识，否则，就会成为无真知无本领的庸人。他说：“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善琴弈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默觚·治篇五》）不“亲历诸身”，不接触实际。只会读前人之书，只能成为害人害国的“庸医”、“庸儒”。在魏源看来，通过接触实际事物而取得直接经验比只谈书本知识要重要得多，因而他反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他说：“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发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默觚·学篇三》）孔子、周公、文王这些被后人奉为“圣人”者，其实也不是什么“生而知之”，而是靠后天发奋学习得来的。即使人的资质有“敏”与“鲁”之区别，但只要后天主观努力，“鲁”者也会变成“敏”者。魏源这种重实行、重亲历、

重学习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对于反对当时崇尚心性空谈，脱离实际，顽固守旧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魏源强调主观必须符合客观。他说：“事必本夫心，……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法必本于人，……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今必本夫古，……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物必本夫我，……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皇朝经世文编序》），这里，魏源提出处理好心与事、人与法、今与古、我与物的关系的原则。从心与事的关系来看，“事必本夫心”，即做事要受人的思想活动的支配，但人的思想正确与否，必须以事实、行为来验证，所以说“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从人与法的关系来看，“法必本于人”，即客观的法则（规矩）要靠人去运用，但人也必须遵照客观的法则而不能凭主观想象造作，所以说“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如果是“恃目巧，师意匠”，那么即使象公输般那样的巧匠也不能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从今与古的关系来看，“今必本夫古”，但古代的思想学说及器物是否有用，那就要在今天的情势中得到检验，所以说“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从我与物的关系来看，“物必本夫我”，即外界的事物发挥怎样的作用，要靠“我”的主观能动性，但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须凭借客观的事物，所以说“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魏源在这里说的“物”，不只指客观的事物，也包括别人的意见，他认为个人对事物的正确理解，往往通过参考别人不同的意见，经过争论切磋，才能使真理逐渐明白起来，这就是他所说的“两心两质而疑难形焉，两疑相难而易简出焉。”（《皇朝经世文编序》）总之，魏源强调，凡是主观的东西必须接受客观实际的检验，方能证实其正确与否，否则便留于无实际效用的虚言。

作为地主阶级的改革家，魏源特别强调提倡“勤访问”学风，他说：“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勤访问，必自其无事之日始。”（《默觚·治篇一》）就是说，一个读书人要想